

国家“八五”社会科学
基金课题研究成果

中国经济
非均衡发展问题研究



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
胡乃武 杨瑞龙 主编

国家“八五”社会科学
基金课题研究成果

中国经济非均衡
发展问题研究

胡乃武 杨瑞龙 主编

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

[晋] 新登字 8 号

责任编辑 冯 梅 齐玉墀

封面设计 漠 舟

中国经济非均衡发展问题研究

胡乃武 杨瑞龙 主编

*

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出版 (太原南内环街 31 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晋中地区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75 字数: 268 千字

1994 年 12 月第 1 版 1994 年 12 月 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

ISBN 7—81032—737—2

F · 36 定价: 10.00 元

撰 稿 人

(按章次为序)

胡乃武	主编, 导论
邹正方	第一、二、十二章
杨瑞龙	主编, 第三、四、七章
张志刚	第五章
赵 睿	第六章
郑超愚	第八章
王 辰	第九章
韦 伟	第十、十一章
王绎频	第十一章

导 论

社会主义经济是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经济的这种社会化、商品化和市场化，客观上要求国民经济按比例地协调发展。正如马克思所说：“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需要量相适应的产品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数量的社会总劳动量。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形式，这是不言而喻的。”^①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实现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就必须保持社会供求的总量平衡和结构平衡，即不仅应使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保持平衡，而且应使社会供给结构与社会需求结构在数量上保持平衡（消费资料的供给量应与消费资料的需求量保持平衡，生产资料的供给量应与生产资料的需求量保持平衡）。马克思关于社会资本再生产实现条件的公式，深刻地揭示了这一点。马克思的社会资本简单再生产的实现条件是： $I(c+v+m) = Ic + IIc$ ， $II(c+v+m) = I(v+m) + II(v+m)$ 。前一公式表明，社会对生产资料的供给应与社会对生产资料的需求保持平衡。后一公式表明，社会对消费资料的供给应与社会对消费资料的需求保持平衡。马克思的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的实现条件是： $I(c+v+m) = Ic + IIc$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68页。

$c + I \Delta c + II \Delta c; II(c+v+m) = I(v + \Delta v + \frac{m}{x}) + II(v + \Delta v + \frac{m}{x})$ 。前一公式表明,社会对生产资料的供给应与社会对生产资料的补偿需求和扩大生产的追加需求保持平衡;后一公式表明,社会对消费资料的供给应与社会对消费资料的原有需求和追加需求保持平衡。正因为社会供求的总量平衡和结构平衡是国民经济顺利发展的基本条件,所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管理足以实现均衡发展为目标的。

但是,实现上述均衡发展目标,并不意味着各个产业部门是等速度发展的。恰恰相反,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经常状况是,各个产业部门总是有先有后、有快有慢地非均衡发展的。技术进步是加快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在机器劳动代替手工劳动的技术进步条件下进行扩大再生产,生产资料必然优先增长。这是列宁在《论所谓市场问题》一书中揭示的一条客观规律。列宁在该书中指出:“增长最快的是制造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生产,其次是制造消费资料的生产资料生产,最慢的是消费资料生产。”^① 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由于农业是自然再生产与社会再生产结合在一起的,受自然条件的影响较大,它的增长速度往往慢于工业的增长速度。根据王积业教授撰写的论文中提供的资料,世界各国在工业化初期,农业与工业增长速度之比(以农业增长速度为1)为1:3,工业化中期为1:2~2.5,工业化后期为1:1.5。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较长时期里,第二产业的增长速度快于第一产业,后来,第三产业的增长速度又快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上述资料表明,非均衡增长也是一种带有规律性的现象。我们在国民经济的宏观管理中,为了保持

^① 《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71页。

一定时期内社会供求的总量平衡和结构平衡,必须以遵循各产业部门间非均衡发展规律为前提,即必须使各个产业部的发展速度保持适当的比例。

以实现社会供求总量平衡为目标的总量管理属于需求管理,即通过调节需求,求得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之间的平衡。社会总需求包括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而货币供应量则综合反映了社会总需求。^① 总量调控是通过调节货币供应量来调节社会总需求的。当社会总需求大大超过社会总供给,或社会总供给大大超过社会总需求时,就意味着出现了总量的失衡。这时,政府应适时进行总量调控。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进行总量调控,必须采取适当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就货币政策来说,主要有以下三种手段:

第一,中央银行贷款利率。当社会总需求大大超过社会总供给时,应适当提高中央银行贷款利率,以减少商业银行的贷款需求,从而减少货币供应量,求得社会总供求的平衡;当社会总需求大大小于社会总供给时,应适当降低中央银行贷款利率,以增加商业银行的贷款需求,从而增加货币供应量,促进社会总供求平衡。

第二,存款准备金率。当社会总需求大大超过社会总供给时,应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以缩小商业银行的贷款规模,减少货币供应量,促进社会总供求平衡;当社会总需求大大小于社会总供给时,应适当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以增加货币供应量,求得社会总供求平衡。

第三,公开市场业务。当社会总需求大大超过社会总供给时,中央银行应在金融市场上抛售一定数量的国债券。国债券的抛售

^① 社会总需求等于货币供应量与货币流通速度的乘积。而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甚微,因此货币供应量可以综合反映社会总需求。

意味着货币的回笼,从而就会减少货币供应量,促进社会总供求平衡;当社会总需求大大小于社会总供给时,中央银行应在金融市场上购进一定数量的国债券。国债券的购进,意味着货币的投放,从而就会增加货币供应量,促进社会总供求平衡。不仅如此,公开市场业务手段的运用,还会通过对市场利率的影响来间接调节供应量。

以实现社会供求结构平衡为目标的结构管理属于供给管理。要进行这种结构管理,就必须建立以国家产业政策为中心的结构调控体系。其中,关键又在于正确制定和实施国家产业政策。正确制定国家产业政策,必须遵循工业化过程中产业演进的规律性,并对未来时期的社会需求结构变化和经济发展趋势做出正确的预测。举例来说,我国 90 年代的产业结构政策目标大体如下:

第一,进一步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增加农产品供给,使其在数量、品种和质量方面都能适应全国人民小康水平和国民经济加快发展的需要。

第二,大力加强基础产业,逐步消除基础产业的瓶颈制约状况,使之与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相适应。

第三,加快支柱产业的崛起,以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振兴。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我国 90 年代的支柱产业是:机械电子、石油化工、汽车制造和建筑业。这是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由于支柱产业的产业关联性强、技术水平高、市场前景广阔,所以加快支柱产业的发展,就可以带动国民经济全面振兴。

第四,合理调整外贸结构,以增强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能力。目前,我国的外贸依存度已高达 37%^①。这表明,外贸已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我国 90 年代调整进出口结构的基

^① 外贸依存度 = 进出口总额 / 国民生产总值。

本思路是：增加资源性初级产品的进口，扩大制成品的出口。

上述国家产业政策，是我们进行结构调控的重要依据。

要有效地进行总量调控和结构调控，必须建立一个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宏观调控体系。这个体系，是由计划手段、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组成的。

所谓计划手段，是指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中长期发展计划以及国家的产业政策。计划手段为经济发展进行导向，是总量调控和结构调控的重要依据。由于计划手段的这种导向作用是其它调控手段所不能取代的，所以它在宏观调控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经济手段是通过对经济主体的经济利益的调节来影响企业的决策，使其决策符合国家计划目标的一种调控手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手段主要有三种，即利率、汇率、税率。由于经济手段的调控，符合市场经济原则，所以它就成为宏观调控体系中的主要手段。

所谓法律手段，是指依靠国家的法权力量，通过经济立法和经济司法机构，运用法规来调节国民经济活动的一种手段。法律手段具有普遍的约束力、严格的强制性、相对的稳定性和明确的规定性等特点，所以它也是宏观调控体系中的主要手段。

所谓行政手段，是指国家凭借其政治权力，通过颁布命令、指示、规定等形式，按照行政系统、行政层次、行政区划来调节经济活动的手段。行政手段的调节具有强制性、纵向性和直接性等特点，它是主要调控手段——经济手段的必要的补充。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之所以还需要采用行政手段，是因为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固然是宏观调控体系中的主要手段，但它们都有其局限性。例如，经济手段的调节具有短期性、滞后性和不确定性等缺陷，法律手段具有固定性的特点，难以对经济活动进行灵活的调节。当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调节无效时，就必须运用行政手段加

以调节。但是，行政手段的调节是着眼于国家的整体利益而忽视被调节者的局部利益，这是同企业的商品生产者地位有矛盾的，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当把对行政手段的运用限制在必要的范围之内。

上述四种手段，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经济手段是一种符合市场经济原则的调控手段，因而它是宏观调控体系中的主要手段。计划手段的独特作用在于它能为其它手段的调控指明方向和提供目标。法律手段能够保证经济手段有效地发挥其调节作用。行政手段是经济手段的必要补充。因此，由这四种手段所组成的宏观调控体系，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能够有效地调节国民经济的运行。

要建立上述宏观控制体系，就必须改革计划体制、财政体制和金融体制，转变政府职能。

计划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实行三个转变：一是从实物形态的管理转变为价值形态的管理；二是从运用指令性计划进行直接管理转变为运用经济手段进行间接管理；三是从主要管理全民所有制经济转变为管理全社会经济活动。总之，要把计划管理建立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计划的制定和实施都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

财政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实行分税制。其主要内容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在划分事权的基础上划分税种。凡是关系到维护国家权益和实施宏观调控所必须的税种划为中央税，如关税、海关代征消费税和增值税、消费税、中央企业所得税等。凡是适合地方征管的税种划为地方税，为营业税（扣除银行、铁路、保险部门集中缴纳的部分）、地方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等。凡是与经济发展直接相关的主要税种应划为共享税，如增值税、证券交易税和资源税等。其中，增值税实行中央与地方“七五与二五”分成；证券交易税是指以印花税形式对证券交易征收的部分，实行中央与地方“五、五”分

成；资源税中的陆地资源税留给地方，海上石油资源税归中央。第二，中央与地方分别设立国税局和地方税局。中央税和共享税由国税局负责征管；地方税则由地方税局负责征管。设立这两套税收征管机构，有利于保证中央的财政收入。第三，中央应集中全部财政收入的 60% 左右。其中，中央支出部分占 40%，另外的 20% 左右的财政收入应按指定项目返还给地方。这就会增强财政宏观调控的能力。

金融体制改革的目标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建立在国务院领导下，能够独立执行货币政策的中央银行调控体系。中央银行的基本职能是：(1)独立地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运用中央银行贷款利率、存款准备金率和公开市场业务等手段，调节与控制货币供应量，以防止通货膨胀，保持币值稳定；(2)对金融机构实行严格的管理和监督，用政策和法规来规范金融行为，维护金融秩序。二是建立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分离的，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金融组织体系。为此，就应把现有专业银行所承担的那部分非盈利的政策性业务分离出来，组建政策性银行。我国已组建了“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和“中国进出口信贷银行”等政策性银行。同时，要把国家专业银行逐步地改造为商业银行。三是建立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金融市场分为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货币市场是经营一年以内货币资金融通的金融市场，它包括银行的短期存贷款市场、商业票据承兑贴现市场、短期国债市场、同业拆借市场等。资本市场是经营一年以上资金借贷和证券业务的金融市场，其中包括中长期存贷款市场、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金融市场的基本功能在于实现资金从多余向短缺、从低效益向高效益部门的转移。因此，建立起统一开放、有序竞争和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就可以优化资金配置，促进产业结构的合理化。

目 录

导 论

第一章 均衡增长与非均衡增长理论模型评述	(1)
第一节 总量均衡增长模型	(1)
第二节 结构主义经济发展理论以及均衡与非 均衡增长战略之争	(11)
第三节 经济增长阶段论和国际依附模型	(23)
第二章 非均衡经济发展模式比较	(31)
第一节 重工业优先发展模式	(31)
第二节 进口替代发展模式	(42)
第三节 出口导向发展模式	(53)
第三章 非均衡环境下的经济发展战略选择	(60)
第一节 经济发展的非均衡环境	(60)
第二节 非均衡环境中的经济主体行为机制	(70)
第三节 均衡取向目标与非均衡发展战略的选择	(81)
第四章 制度创新与经济发展	(90)
第一节 制度创新与经济增长的源泉	(90)
第二节 制度供给不足及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98)
第三节 增加制度供给, 推进我国的经济发展	(108)
第五章 劳动力市场与非均衡就业战略的选择	(118)
第一节 人口压力与中国的就业模式	(119)

第二节	未来我国非均衡劳动力市场的特征	(130)
第三节	实现充分就业的制约条件	(140)
第四节	非均衡就业战略的选择	(148)
第六章 资本短缺、资本效率与非均衡增长	(152)
第一节	资本短缺与资本效率	(152)
第二节	金融深化与资本利用效率的提高	(160)
第三节	投资、结构调整与非均衡增长	(169)
第四节	结论与政策	(175)
第七章 技术创新、技术选择与经济发展	(179)
第一节	技术创新与经济发展	(179)
第二节	技术选择与经济发展	(187)
第三节	我国经济发展中的技术创新与技术政策选择	(195)
第八章 总量失衡、需求管理与经济发展	(207)
第一节	经济发展、经济稳定与总供给总需求管理	(207)
第二节	我国总供给总需求分析的初步理论框架	(215)
第三节	我国总需求管理的初步定位	(228)
第九章 产业结构的非均衡演进战略选择	(245)
第一节	基础产业的非均衡发展战略	(245)
第二节	主导产业的非均衡发展战略	(257)
第三节	基础产业与主导产业的比较分析	(273)
第十章 我国地区经济发展失衡与非均衡增长	(279)
第一节	我国地区经济发展失衡的现实	(279)
第二节	我国地区经济发展失衡的成因	(290)
第三节	区域经济发展理论比较及协调政策选择	(299)
第十一章 开放经济非均衡发展战略选择	(310)
第一节	开放经济非均衡发展的定义及其成因	(310)

第二节	开放经济发展的合理梯度结构	(318)
第三节	开放经济非均衡发展模式与战略选择	(327)
第四节	开放经济梯度发展的宏观调控及其政策选择	(331)
第十二章	国际收支平衡与经济发展	(336)
第一节	国际收支平衡的概念	(336)
第二节	国际收支失衡的类型和原因	(349)
第三节	国际收支调节	(357)

第一章 均衡增长与非均衡 增长理论模型评述

第一节 总量均衡增长模型

总量均衡增长模型主要是以发达国家的经济为研究对象,讨论一个国家如何扩大其商品和劳务的产出量。这种模型所选择的变量都是概括性的总量(如投资和储蓄、资本和产出等),采取均衡增长的手段实现总量均衡的目标,并用数学模型来表示的,故称总量均衡增长模型。主要的总量均衡增长模型有哈罗德——多马模型、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新剑桥经济增长模型等。

一、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

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是40年代末期英国的哈罗德和美国的多马,根据凯恩斯收入决定论的思想,几乎同时提出的一种经济增长模型。哈罗德和多马认为,为了抵补前一阶段生产中资本品(建筑物、设备、材料)的消耗,任何一种经济都必须从国民收入中储备一部分。但是,为了求得生产的增长,则必须注入体现为资本品增加的新投资。总资本存量的多少和国民生产总值的大小之间存在着由技术水平决定的某种直接经济关系,这种关系称为资本—产出率,它表明1个货币单位产出需要多少货币单位资本的投入,或每增加1个货币单位的产出需要多少货币单位资本的投入。

也就是说，资本——产出率可以是平均资本——产出率，也可以是边际资本——产出率。新增的资本来自国民收入的储蓄部分。因此，要实现产出的增长，必须得到一定国民收入水平和一定储蓄率的保证。可见，产出增长的快慢与收入水平、储蓄率和资本——产出率密切相关。用动态观点说，一个时期的储蓄转化为资本即新资本形成是该时期产出增长的源泉，而产出增长又成为进一步扩大资本形成的基础。哈罗德和多马将这一思路用数学形式表现出来，即成为增长模型。它的数学推理过程如下：

由于储蓄率 S 是相当比率(即储蓄率 S)的国民收入 Y ，从而有

$$S=sY \quad (1)$$

资本存量的变化即是投资，设投资 I 为资本存量 K 的增加额，用 ΔK 表示，则

$$I=\Delta K \quad (2)$$

但是，由于总资本存量 K 与整个国民收入或总产出 Y 有直接关系即资本——产出率 R ，从而有

$$\frac{K}{Y}=R;$$

或者 $\frac{\Delta K}{\Delta Y}=R$ ，即 $\Delta K=R \cdot \Delta Y \quad (2a)$

由于一国总储蓄 S 必与总投资 I 相等，所以可以把这个等式写作

$$S=I \quad (3)$$

由上述方程(1)知 $S=sY$ ，从方程(2)与(2a)中已知 $I=\Delta K=k \cdot \Delta Y$ ，则

$$S=sY=k \cdot \Delta Y=\Delta K=I \quad (3a)$$

或简单地表示为

$$SY=k \cdot \Delta Y \quad (3b)$$

在等式两边除以 Y , 然后除以 k , 得

$$\frac{\Delta Y}{Y} = \frac{s}{k} \quad (4)$$

式中, $\frac{\Delta Y}{Y}$ 为产出的变化率或增长率, 如用 G 表示则为

$$G = \frac{s}{k} \quad (5)$$

即产出增长率 = $\frac{\text{储蓄率}}{\text{资本—产出率}}$

这就是著名的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哈罗德和多马用一个简单的公式给出了下列明确的涵义: 产出率是由国民储蓄率和国民资本—产出率共同决定的, 产出的增长率与储蓄率成正比, 即是说, 一定水平的产出中储蓄率越高, 产出的增长率就越大; 产出的增长率与资本—产出率成反比, 即是说, 资本—产出率越高, 产出的增长率就越低。因此, 为了实现经济增长目标, 一个经济就必须从产出(国民生产总值)中拿出一定比例作为储蓄并转化为投资。储蓄越多, 投资就越多, 从而增长也越快。但是, 在每一水平上的储蓄和投资所带来的实际增长速度取决于投资的生产能力, 即取决于一份投资能增加多少产出。投资的生产能力可以用资本—产出率 R 的倒数, 即产出—资本率来衡量。

哈罗德—多马模型的理论意义首先在于, 它向人们证明: 投资具有二重性, 即投资既可以创造收入, 也可以增加生产能力, 即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促进经济增长, 从而发展了凯恩斯的理论, 将其长期化、动态化。

其次, 它为分析经济发展中的投资率(储蓄率)、资本—产出率和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种方法: 欲提高增长率, 要么降低资本—产出率, 要么扩大投资率。在所观察的时期内, 一般来说, 资本—产出率是相对稳定的, 因而, 要维持或提高国民收